

设计生态学

俞孔坚的景观

DESIGNED ECOLOGIES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KONGJIAN YU

[美] 威廉·S·桑德斯 主编
William S. Saunders (ed.)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设计生态学: 俞孔坚的景观 / (美) 桑德斯

主编, 俞孔坚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112-14777-9

I. ①设… II. ①桑… ②俞… III. ①景观设计—园林设计

IV. ①TU9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5531 号

责任编辑: 郑淮兵 戚琳琳

责任校对: 刘梦然 陈晶晶

设计生态学
俞孔坚的景观

DESIGNED ECOLOGIES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KONGJIAN YU

[美] 威廉·S·桑德斯 主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960×1270毫米 1/16 印张: 15 1/2 字数: 375千字

2013年2月第一版 201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80.00元

ISBN 978-7-112-14777-9

(2281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美] 威廉·S·桑德斯 主编
William S. Saunders (ed.)

设计生态学

俞孔坚的景观

DESIGNED ECOLOGIES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KONGJIAN YU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4
中文版序言
传承与革命
威廉·S·桑德斯
William S. Saunders

5
前言
俞孔坚的挑战
彼得·沃克
Peter Walker

6
引言
愉悦的生态
威廉·S·桑德斯
William S. Saunders

8
人民美学与公众历史
约翰·伯得斯利
John Beardsley

18
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中山岐江公园

32
中国城市化的误区与土人的另类设计
安琪·施托克曼
Antje Stokman

40
大脚革命
俞孔坚
Kongjian Yu

48
丰产的景观：
沈阳建筑大学稻田校园

54
艺术之田：
芝加哥北格兰特公园

58
牛背上读书的男孩
威廉·S·桑德斯
William S. Saunders

64
与洪水为友：漂浮的花园——
浙江黄岩永宁公园

76
再造城市滨水景观：鄞州中心
区河道改造

82
最少干预：秦皇岛红飘带公园

92
再生设计：秦皇岛海岸带生态
修复

98
功能性景观的公园化：秦皇岛
森林公园

104
激进的教育家
弗雷德里克·斯坦纳
Frederick Steiner

114
让自然做功：适应性调色板
——天津桥园

122
聚人的场所：天津水岸廊桥

130

聚人的场所：睢宁流云水袖桥

134

聚人的场所：都江堰广场

138

聚人的场所：波士顿新中国城
公园

142

生态规划的神话与策略

克里斯蒂娜·希尔

Kristina Hill

150

绿色海绵营造水适应城市：哈
尔滨群力雨洪公园

162

景观作为生命系统：上海后滩
公园

182

中国水资源与后滩公园

彼得·G·罗

Peter G. Rowe

188

再造秀美山川：国土生态安全
格局规划

196

传承性和革命性的生态基础
设施

凯利·香农

Kelly Shannon

206

景观引导城市发展：北京城市
增长规划

216

生态基础设施先行：武汉五里
界生态城

220

母亲河的重生：
迁安三里河绿道

228

弹性的河流：明尼阿波利斯滨
水城市设计

236

让景观融入建筑：低碳之家

240

让建筑融入景观：张家界哈利
路亚音乐厅

244

跋

生态规划的生生不息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

Charles Waldheim

248

附录

文章作者

项目贡献者

本书中文译者

传承与革命

威廉·S·桑德斯
William S. Saunders

为何俞孔坚的景观设计与土地规划既是激进的而同时又是保守的呢？为什么俞孔坚倡导回归中国古代传统，然而他的名字在业界却又是先锋派的代名词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解读一下 20 世纪以来的现代化。现代化浪潮肇启于 19 世纪的英国与美国的工业革命，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知识和技术的突飞猛进。忽然间，疾病可以被药物控制，距离可以被汽车、火车和飞机征服，农业也由于农药和化肥的施用而成倍地增收；数以百万计的居民住进了城市高楼大厦中。人类这样一个学会了支配其他所有生物的物种，开始幻想是否已经同样可以用人类的设计来支配自然过程了。而其中极端自大、乐观的一派在 1969 年登月成功之后，更是野心膨胀。

然而这些之后，大自然就开始了她的报复。有益物种逐渐灭绝。水变得不可饮用。污染导致疾病的产生，最终全球气候变化的风暴剧烈上演。俞孔坚在他的家乡也见证了这一切的发生，他所深爱着的溪流中的植物和动物，都被工业污染物和所谓的水利工程无情地践踏，消失殆尽了。

中国的现代化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剧烈的，同时也带来了令人惊奇的经济和技术进步。但从土地利用的角度来看，这好比活生生地砍掉一片原野上的树林，而将其“拓荒”为停车场，这样的“发展”是自杀式的。这必将带来地表水枯竭，地下水被污染；能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这时早已不见踪影。

像俞孔坚小时候的家庭所经营的传统农业，是顺应自然而发展的，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如果你不懂得顺应季节和天气去种植庄稼，你就注定不会有收成。当现代灌溉技术被发明以后，似乎我们都可以忽略干旱带来的影响。但是现在整个世界都认识到，如果我们不顺应自然的话，我们就会被置于死地。

虽然俞孔坚深爱着以往的中国农村，但他也并非简单地倡导回到古代。因为他深知现代先进的土地管理方式已经由来已久，不可撼动。而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借助最新的科学技术来管理土地。对于当下来说，最先进的现代方法却又是恢复过去那健康的水土状况的最好手段。俞孔坚在后滩公园的设计里就体现了运用最先进的、有关植物吸收污染物的知识，通过营造梯田湿地，种植不需修剪的草本植物来净化水体。在当下，我们必须为自然创造最好的条件让她做功。否则我们就是在继续阻挠她的功力。

遗憾的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助力之下，中国的景观设计师和土地管理者似乎比他们的西方同行更少地看到现代化的弊端。（我们告诉中国人，不要走我们的老路）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俞孔坚的作品在美国，相比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和关注。然而俞孔坚在中国也把握住了很重要的一点：市长们拥有着土地利用的决策权。从这方面来说，他比西方同行高明多了。

中国应该引以为豪的是，这位引领全世界景观设计行业的设计师，竟是她亲身养育的儿子。

俞孔坚的挑战

彼得·沃克
Peter Walker

纵观俞孔坚丰产而高绩的职业生涯，有三个方面也许最能吸引全世界景观设计师们的关注。第一是1995年从哈佛大学取得设计学博士后，归国创办的土人景观所设计出的大量作品。第二则是在中国过去二十年高度城市化的背景下，他在景观设计领域的学术影响。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他的设计项目实践并检验了西方学界大多还停留在理论阶段的想法。

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行业中耐心的缺乏导致了景观规划从景观设计中分离。这样的分裂将奥姆斯特德的理念一分为二，同时将政治的权力和视野从景观设计师手中夺走，使得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具有空间性。另一个更进一步的分裂发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将土木工程从景观设计中剥离出来。有迹象表明，中国也有着同样的趋势。比如在中国大学里，设计与物质空间规划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不过，它们之间还是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并被划分到同一个学院里，在那里老师和同学们仍然保持着日常交流。我们也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能够抵抗住这种潜在的分裂。诚然，无论是通过话语还是实例，俞孔坚都在定义着一个阈值更宽广、更具综合性的行业。

在美国与欧洲，景观设计与区域规划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审视，土地规划在行业划分上大都与景观设计相分离。基于这种行业的分离，产生了相应的各自独立的教育。然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基于生态学的规划，以及哈佛大学的卡尔·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基于方法论的教育，却是两个特例。20世纪末，上述两种规划途径的继承者们已在进行将这些方法与设计相结合的尝试。具有实质性的进步正在展开。

中国已成立了许多家景观设计与规划相结合的事务所。这些设计事务所往往都立足于一个大学，规划的空间尺度大到区域，小至单个的场地。或许可以预见，无论在哪个向度上，大量的作品都显得缺乏创意且质量平平。然而，俞孔坚的作品，尽管也贯穿于由小到大的各种尺度，但无论在创意和实施上，都接近了一个尽善尽美的水准。在中国，他成功地引领这个行业脱离以经济与工程为首要考虑目标的道路，使景观设计回归到基于生态的规划。在各个开发尺度上，其设计的景观达到了概念与建造上的极高的美感——这是在西方很少达成的理想之境。奥姆斯特德愿景的裂痕似乎已经被荡涤殆尽，景观设计学

正自由地拓展到最广阔的视域中。

俞孔坚的空间设计中将农业景观纳入其中，以作为空间划分的手段和生产性景观的设计隐喻。他也常常将雕塑语言纳入到设计中，令人想起同样基于农田景观的17世纪勒诺特花园。受到种植作物的田野的启发，雕塑有节奏的紧凑排列，使得设计能够控制由微小到广袤的空间，这样一种朴素的技巧，把当下对于自然的怀乡情结置于一种可控而可视的组合中。人们会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俞孔坚大胆而精彩的方案在大城市和区域规划的空间中得以实现的景象。

俞孔坚的作品已经表明，最宏大和最普遍的理念是能够付诸现实的，而且这些优秀的建成项目能够在空间形态方面给未来规划的发展指明方向。这些项目作为范例，正对全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行业发挥着显著的影响，尤其在那些范例能够被观摩、认知和学习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也许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在经济和社会气候层面都能让这样的范例成为可能的国度。此外，俞孔坚已经向我们证明：微观尺度的场地和宏观尺度的区域，作为设计尺度中最小和最大的两个极端，能够如此相得益彰。

作为一个在推广综合规划设计道路上的不知疲倦、勇于开拓的先锋，俞孔坚的成功，有一部分得益于用自己的理论来指导那些决定未来中国政治版图的众多市长们。无论这个四分五裂的行业表面上看起来完整与否，规划和设计的内在关系是能够被清晰地呈现在学生、未来的公司客户，以及形成同盟的从业者面前的。土人景观与北京大学的联合为俞孔坚与公众和学术界直接对话开启了平台。他的成就，无疑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规划与设计行业产生影响。

诚然，不是每一位从业者都能够像俞孔坚一样在行业中有着如此广博的涉猎，但景观都市主义的拥护者们认为景观设计师理应如此。从业者们与咨询师之间的亲密合作当然能够克服单个设计师个人专业方面的局限性，来实现景观设计专业范围的整体性，土人的作品也展示了跨尺度整体综合设计的巨大价值。我们都有理由希望这些在宽广的尺度范围内的绝佳示范，能够强化和激励西方在理论性和综合性道路上的更加深入的探索。通过他精彩的作品，俞孔坚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典范，同时也是对于我们所有人的挑战。

愉悦的生态

威廉·S·桑德斯
William S. Saunders

毫无疑问，俞孔坚是推动当代景观设计发展的主要力量（也许是最主要的）。他对当下我们最迫切的诉求提出解答方案：我们需要将与自然力量的互动方式，由自杀式的漠视，转变为尊重与合作。一个现象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我们试图把人类的需求和意愿强加给自然，而自然则用风暴、洪水、干旱和贫瘠的土地来报复人类。正当我们赢得了对所有物种的统治时，正当我们用通信和交通技术超越了这个地球上距离和障碍对我们的限制时，我们之中超过半数的人所拥有的城市生活，却限制了我们对于土地、动物、气象和地理的体验——此刻，我们懂得了，我们必须转身、必须放弃、必须服从、必须合作。我们还有机会让我们的文明摆脱两个世纪无知地自我毁灭，并且还有望让我们的子孙能够看到一些动态平衡的恢复。我们必须守护好上帝给予我们的恩赐，诸如生命、水、太阳、风等，以此来延续我们的文明，而不仅仅只是把我们所创造的东西强加给自然。

相信本书的读者中很少有像俞孔坚一样切身且直接地经历过这些现实。他曾经是中国万千农民子弟中的一个，实践着千年传承的将自然转变为农田，又让农田回到自然的古老技术——这样的技术能够应对洪灾、干旱，或者其他极端气候，还能满足植物动物群落生存的需求。在他大学求学期间，那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生命火花绽放的时候，一场如闪电战般的现代化“袭击”了他的村庄：树木和其他乡土植物都被砍光，河道和溪流都被渠化、硬化；鱼儿死去；水变成了一种被管道输入和输出的东西，而不是为我们在乡间看到的有着种种丰富情趣的存在了。

对于我们和俞孔坚来说，古代的成功案例并不能作为故事的结尾。作为一种复合的存在，人与自然成功的合作是不能将美感和愉悦以及它们内在的和谐排斥在外的。这种和谐的复合体绝不是一个良好运转的机器，也不是回到纯真和蒙昧。俞孔坚曾经是被当成一个科学家、植物学家、遗传学家来培养的，然而他对哪种草在哪种环境下能够蓬勃生长的判断，既是建立在最新的科学研究上，同样也是建立在他对儿时回忆上的。他并不是那种持有人与其他“众生”全无二致观念的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对于他来说，与村民们在夜晚聚集在村头的古树下，聆听那些有关祖先和神灵传说的经历，是人与树的友谊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父母被当做凌驾于农民之上的地主富农分子，被批斗和虐待，而且之后他在北京又被人当做“乡巴佬”遭受嘲弄，但他仍然对普通大众保有一种共产主义者般的忠诚。

这一切都是怎样叠加起来的呢？虽然在自然与文明之间重新构建一种健康的关系是俞孔坚做设计的主要驱动

力，但他同时也有其他几方面的动力：去创造美和艺术，去丰富每一个人的乡土生活，去设计能够吸引和提升社会交往的空间，去保护文化遗产，去将土地变得更丰产，去教育人们是什么使得土地能够承载生命，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有的人会说这显得太过巨大了。然而，俞孔坚是一个仿佛精力无限的充满着雄心壮志的人，他的工作同时在多个层面上进行。

我们可以为他有如此的雄心壮志、为他有着吞咽下一切的胃口而欢呼——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对他的作品需要批判性地审视。当一个人在达成如此多的目标时，他的作品的风格是否会变得破碎或失去统一性呢？俞孔坚能避免这一问题吗？他的公园是一系列离散要素的简单拼加么？一片玉米地与先锋派雕塑凉亭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一处涂了油漆的废弃厂房在一片野草和人工湿地中的存在的意义到底如何？精致地翻着绿浪的草地，与布置其中的关于草是如何吸收有毒物质的科普标识牌之间的关系和谐吗？

我们对俞孔坚的多重兴趣和志向还有些不习惯：我们知道彼得·沃克会为我们提供光鲜的艺术形式和精致的感官享受，而且我们会觉得这就足够了。理查德·哈格（Richard Haag）的西雅图煤气公园以及彼得·拉茨（Peter Latz）的北杜伊斯堡公园代表了对于废弃工业结构的重视。劳瑞·欧林（Laurie Olin）在纽约的布莱恩特公园更多地是为了聚集游人而不是为了吸引人对其美丽树丛的关注。也许迈克尔·冯·瓦肯伯格（Michael Van Valkenburgh）在多重目的方面与俞孔坚最为相似，至少在美学、社会和生态层面他对于他的泪园（Teardrop）和布鲁克林公园是有着同样的考虑的：在公园中各种元素是优雅地组合在一起的呢，还是因为有太多元素而显得破碎？诚然，在背景中熠熠生辉的依然是奥姆斯特德，特别是中央公园，它同样悄无声息而严密地达成了多重目的。或许由于我们的时代对于后工业场地的修复以及处理生态芜杂的需要，使我们将这些要素都组合在一起而形成非真实的统一体。对此，我们也不是完全无辜的。

让我说得更明白一些：俞孔坚的公园是多重动机因子良好组合的产物。秦皇岛的红飘带公园就是最好的例子：它的核心就是一条红色玻璃钢长凳，蜿蜒穿过了一公里长的河岸树林。这条长凳在身心上都是令人愉悦的：构思大胆，充满活力，好玩有趣，出人意料，并且造型美丽[他蜿蜒造型的灵感更多的是来自中国书法而不是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它格外地引人入胜，因为它将人们引向了难以看到的空间。这样它就形成了一条让人忍不住

想去探访的路径，一条如绿野仙踪般的令人迷醉的路。很多人想在这条魔法飘带坐上一坐，也有的人躺在上面酣然入睡，在飘带的转角处也聚集着游人。当我在那里时，有的人就在那里躺着睡觉，很多人玩着纸牌游戏，还有人吹着笛子，孩子们在飘带上或是旁边的小路上奔跑。就像俞孔坚说的那样，设计的干预是微小的：飘带轻轻地卧在这片土地上，而公园其余的部分是原来自然荒野的面貌。但正是这样，我们也就一下子同时拥有了社会、艺术以及生态价值。艺术可以吸引游客来到公园。它那令人愉悦的线条同时也是留住人们的长凳。保护自然过程的目的也和简洁的外形完美结合。所以我认为，这是俞孔坚最完整和成功的作品。

让我们来将其对比一下规模最大也是他最寄予厚望的后滩公园——在那里同样也有一段令人迷醉的园路。但寄托了太多的创意或许使它显得过于复杂了一些。公园意义的标志之一是解释湿地是如何净化污染的河水。多种多样的植物被编入了鲜艳美丽的组团之中：野草、向日葵、玉米、菖蒲（*Acorus calamus*）等。后滩的内涵类似于百科全书。其中，竹林步道恬静高雅、做工细致、深入细节。菱形的折钢板亭让人感受到大胆的当代风格[与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相类似]。然而这些元素好像构成了一些不能连续的瞬间，每一个空间都引人入胜，但似乎显得有一些离散。游人的关注度在这样大尺度的空间中会渐渐消减，不如在红飘带公园的空间那么友好和亲近。如果是在夏日的骄阳下走完整个公园，这个过程对于游人来说或许会太长了一些。在折钢板亭下面没有地方可坐。俞孔坚或许认为整个公园的核心便是证实污水是如何在过滤及曝气技术下被净化的。但是我想后滩仍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环保和生态技术（通常需要在较大的空间中实现）如何与为人们提供社会交往服务相结合。

沈阳建筑大学的稻田项目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景观设计如何同时兼顾人的需求和生态的需求。这个设计所要支撑的理念是，农业景观也能够与城市生活相统一。我们为何要花费如此多的土地、水和化学药剂去建设维护巨大的校园和公园草坪呢？稻田和麦田在高产出和低维护费用的同时也可以带来美的享受，鸟儿可以在庄稼中筑巢，让学生们明白他们觉得理所当然的粮食是怎样产出的。还有农田可以带来美感，特别是风中掀起绿浪的景象。但是在这里交往空间也显得有一些单调——稻田中长而直的网格状步道，它们并没有产生引人入胜的游憩空间，尽管俞孔坚在稻田中也多多少少设计了座椅。人们不愿在玉米地里聚集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俞孔坚想在一个项目中实现多个目标，是否意味着限制了每个目标的完美实现？对俞孔坚，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浪费土地是一种罪孽。每一寸可耕作的土地都用来供养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确保更广大范围内人们的生存，就像在俞孔坚小时候生活的那个村庄一样。让俞孔坚的父亲吃惊的不是北京的高楼，而是那里的土地上的植物不事生产。如今，一部分人怀着他们对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信奉，开始不遗余力地推销乡土食物以及都市农业。然而，即便是站在一个真正的农民的角度，俞孔坚也明白，在城市中，农业的生产力相对于它的美学和游憩价值来说，毕竟还是次要的。

当我刚开始研究俞孔坚作品时，我以为他的作品和其他当代景观设计作品一样都受到了生态效应妄想症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迈克尔·冯·瓦肯伯格在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校园的设计中，首先用种有菖蒲的沼泽将尚未流入湖泊的水进行收集，这样径流中掺杂的无机物、化肥还有汽车尾气等废物，就可以在地表径流汇入湖水前被过滤掉一些。但这样的做法就可以使瓦肯伯格成为湖水的救星，就把韦尔斯利校园变成了可持续的景观了吗？其实远不是这样的，想达成这样一个目标任重而道远。这也和后滩水处理有些相似之处。现在的客户和景观设计师似乎都只是在在一个较小的尺度上思考，而不是像在区域的大尺度上有所作为。但是俞孔坚不是这样认为的：他知道他是在为将来巨大的变革制造可实施的实验范例，而这些变革现在看起来似乎还是遥远的。他告诉我“我传递的信息比结果更重要”，“最重要的是指明一个正确的方向。”

俞孔坚反装饰、反化妆堆砌是相当极端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他正确地抨击了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现代城市“化妆师”：将高速公路两旁布满了花卉彩带，栽满了煞费工夫修剪的绿篱，浪费无度的装饰工程，不计成本的维护工程。他也正确地抨击了将美化工程作为“后农业文明”社会财富的象征（就像中国过去的裹脚一样）。以一个农民的眼光看来，凡尔赛花园就是恶心的堕落，一只“皇家公鸡”的搔首弄姿。俞孔坚告诉我：“美来自于对需求的满足。文化是对自然的适应，可持续策略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但问题在于我们的需求不只是生存，文化可以说是生命本身从自然那里的持续的瞬间释放。俞孔坚可能对于我对拙政园的珍爱有些失望。确实，拙政园的太湖石显得有些过于华而不实。但是它的“无用”以及完全人工化的栽植、园路、水池、亭台显得超乎寻常的美丽，因为这一切都被放入了一个和谐、恬静、平和的境域中，这是自然的、追求生存的抗争所无法达到的高度。诚然，在农民为生存的抗争中也有高贵的品质，但把另外类型的文化贴上纯粹装饰的标签就有点像清教徒的道德主义了。

在现实中，俞孔坚也许并非真正是这样想的。他为什么会花力气将工业构造粉刷的靓丽，置于公园中？为什么在他的公园中，生态的野草既能够做到低维护，又可以顺畅地绽放着美丽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吉斯·克莱门特（Gilles Clément）的“运动中的花园”（*Garden in Movement*），他将花园规划得朝着荒野的风格发展。或者更有甚者，现代德国的景观设计师认为在公园中唯一的人工干预便是开辟园路而已，其他的部分全部留给自然去完成。我问俞孔坚为什么不把他的作品做成只是对荒野生态的一种留存，这样便使其上升到了最终极的生态高度，没有任何的“碳足迹”，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维护。他给了我两个答案：这样就会将景观设计师的作品比现在更加游离于人们的视野；而且荒野也无法满足人类对身份认同的需求。所以，事实上，俞孔坚不是生态纯粹论者，更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朝圣者。可持续农业，从实质上讲就是人类在利用自然和顺从于自然之间求得平衡，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景观设计师的核心理念。所以他也应该承认，他和我们大家一样，同样迷恋于那些“无用”的美丽。

人民美学与公众历史

约翰·伯得斯利
John Beardsley

当俞孔坚向党政干部或市政官员阐述项目理念时，他的演说不由自主地充满着革命性的修辞¹。他将传统中国园林和装饰性的现代城市园林斥为“小脚艺术”，就像古代少女的裹脚以求嫁入豪门。他大篇幅地宣扬、阐述他“大脚美学”的理念，这些理念植根于生产性景观和普通人的文化体验。他在演讲报告中，展示着年轻的毛泽东和健康的劳动妇女的形象，以五星红旗和欢呼的工人为背景。用诙谐甚至是略有些讽刺性的方式——至少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是如此——竭力推广他的理念：“小脚”艺术不仅带来了平庸的城市规划设计方案，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恶化。化妆术凌驾于功能上的需求，城市替代了乡村，结果人们甚至忘记了如何安全地、可持续地生存，干旱、洪水、栖息地消失、环境污染随之而来。

他的理念极富感召力，甚至超乎他的预料。中国几十年来工业化和剧烈的城镇化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而病态的环境审美观正是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尽管他对当前城市设计和环境管理政策的批判态度仍十分鲜明，但通过演讲、著书、撰文、电视节目、授课等途径，他的观点已经开始赢得一些公共管理者的青睐。据他本人的估算，1997年来，他给政府官员培训班授课平均每年2-3次，每次大约有50名市长级官员参与，并将这些观点总结出版：《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²。该书于2003年出版，在中国广为发行传播，部分也通过俞孔坚自己的赠送。如今该书已经第十三次印刷，总计发行超过16000册。俞孔坚也在电视节目中阐述他的观点——他估计过去十多年中参加电视节目大约30次，其中10次是在中央电视台。他还出版了其他的著作，撰写大量文章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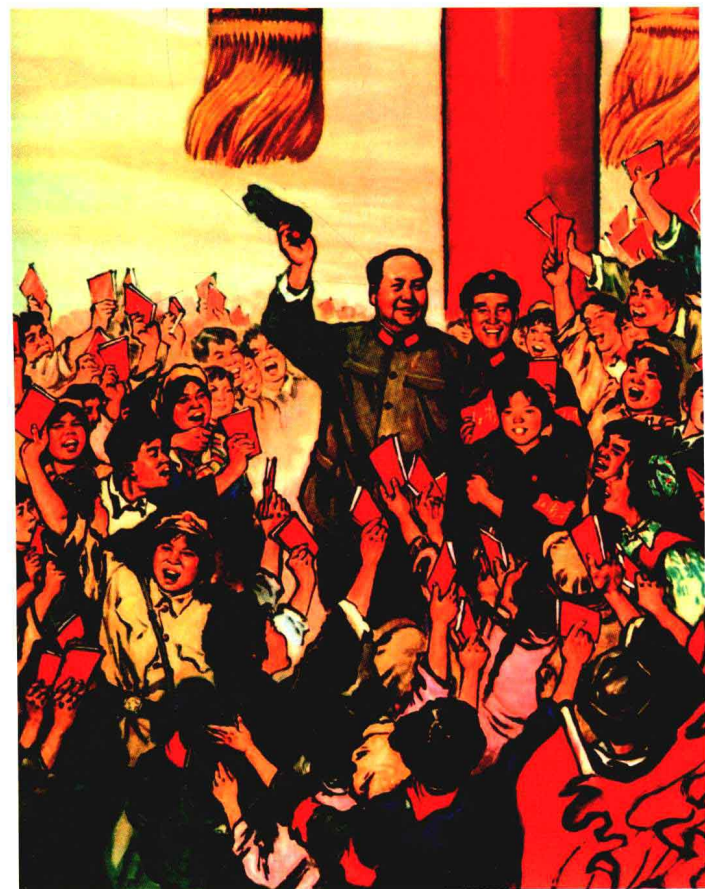
会议论文。他还担任《景观设计学》杂志的主编。他和他的设计研究院——土人景观，在许多城市开展设计实践，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沈阳、中山、成都等；俞孔坚还服务于不少城市的规划委员会：北京、杭州、苏州、中山，并且是青海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城市建设顾问³。

在视觉层面，现代中国城市中有大量的证据支持俞孔坚的论断，尤其是城市设计的失败。正如他指出的，典型的当代中国城市景观是昂贵的、装饰性的和需要高成本维护的。

几乎随处可见，成排的树木和经过修剪的灌木，中间穿插着修剪的树篱、五彩的鲜花、各种观赏植物。各地的公路边缘、城市街道、公共广场看起来都是一致的，毫无地方特色。

相比之下，俞孔坚提供了一个美丽的愿景，其理念植根于农业和生态：庄稼地和稻田，湿地和鱼塘，河流和森林。这些景观可以生产食物、净化水、提供生物栖息地，并同时提供文化和生态服务。与眼前规整的和装饰的景观针锋相对，他歌颂“杂草”和粗野：正如他所说的“野草之美”，在我们的对话中他屡次提到，他的一本书也以此命名⁴。乡土的、生产性的景观是他的生态和文化生存概念中至关重要的理念，这也正是他尝试从各个尺度进行实践的出发点。我将国土和区域尺度战略的评论留给其他的评论家，我的重点是阐述城市基质下的乡土或“杂草”美学，在某些方面，它们是对当今现实的最大挑战——甚至，在中国的背景下是革命性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俞孔坚将他对乡土景观的挚爱部分归结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历。他出生于1963年，浙江省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家庭在1949年丧失了土地和油菜籽榨油厂。他童年时，家里的房子被洗劫的记忆，珠宝和家具被一抢而空，家庭成员被抓到大街上游行示众。他回忆说他的父母曾被抓去当义务的街道清洁工，他甚至被赶出中学一年，作为对他家是地主富农成分的一种惩罚。但他回忆道，夏天，他们在社会主义集体公社干活，种植和收割水稻、蔬菜，放养水牛，这些农活也是他辍学一年中的主要活动。俞孔坚坚持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童年的经历决定了他执著于乡土和生产性景观。这种执著更多出于这些景观的功能而不是形式，更准确地说，出于这些景观的形式和功能的统一。



文化大革命中印有毛泽东的宣传画。在这方面俞孔坚主张毛主义的回归，景观管理应重新回到“为人民服务”的方式。



北京街头典型的道路中央的绿化隔离带，种满装饰性的植物，需要不断地维护；俞孔坚认为这是挥霍的景观、肤浅的美化。

成年以后，俞孔坚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实践，将乡土景观理念应用到设计作品中。作为乡中学600名学生中的唯一通过高考被录取进入大学的应届考生，他于1980年被北京林业大学录取。因为高考分数比林学专业的录取线要高，他被邀请进入园林专业，他记忆中那是当时中国大学中唯一的园林专业。在那里，他学习了传统中国园林设计和园艺的基本概念，“但没有生态学”。他在1987年取得了园林专业硕士学位，并钻研景观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及大尺度景观规划方法，尤其是接触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如景观设计师和地理学家欧文·H·祖伯（Ervin H. Zube, 1931–2002）、区域规划师和哈佛大学教授卡尔·斯坦尼兹⁵。俞孔坚随后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系统地学习了这些理论，并于1995年获得设计学博士学位。

在回国后，俞孔坚独特的设计语言得以逐渐展示。他的设计手法在中山岐江公园（2001年）项目中初现端倪，那是他的第一个较大的项目。1997年，中山市市长在一次市长论坛上听了俞孔坚的演讲，并邀请他参与中山城市总体规划研究。之后不久，该市一座造船厂破产，他们邀请了土人景观参与设计竞标，将10公顷（25英亩）的原场地改造成公园。破产的造船厂原址上遗留下废弃的水泥、钢结构的旧厂房、泥泞不堪的步道以及大量的工业废弃物。河流沿岸留有一些古榕树，然而，这些古榕树面临被砍伐的危险，因为水利工程部门正计划拓宽河道以增加过洪断面。



原工业厂房的钢架结构,中山岐江公园,2001年,土人景观设计。
俞孔坚通过再利用途径,保护了普通的工业遗迹。

俞孔坚成功地说服了地方官员,尽量多地保留场地内“最有价值的”要素:通过新开挖一条内河,保留了古榕树;钢结构的厂房被保留下来,或形成新的地标,或用作公园服务设施如洗手间、公共休息室等。两个古老的水塔被改造成灯塔:其中一个剥掉了水泥外衣留下钢构骨架,并被涂成红色;另一个被装入玻璃盒子,晚上可以发光。在公园北部和南部的入口处新建了城市广场,通过步行道将公园与城市联系起来。从任一入口,访客都要穿过一段水面和浓密的树林,形成了拥挤嘈杂城市与公园环境之间的缓冲。进入公园内部后,游客则被分散到各处开放空间。

在公园内部,交通井然有序,有环绕公园的环状游道和纵横交错的直线步道,其中一条直线道路是旧有铁轨改造的。受潮汐的影响,公园内湖水位每天落差1米多,岸边的梯级台阶营造出便利的亲水空间。上述设计并没有显得特别乡土或“芜杂”。事实上,公园内部交错的线条和网格让人想到了彼得·沃克的

作品,那种风格是在经受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美国极简主义雕塑艺术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的。诚然,公园丰富的体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是由一系列明确可见和可感知的景观小品组成。



中山岐江公园的外围边界,通过浓密的植被形成了一条令人愉悦的缓冲带,将城市的烦躁气氛隔离在园外。



笔直的园路和几何树篱，让人想起彼得·沃克的景观设计作品

这个公园的审美风格与它所处的大环境截然不同。俞孔坚说，位于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市，是全国最早大规模营造装饰性景观的城市之一。这里诞生了许多在中国属于首创的旅游度假景观：第一个高尔夫球场、温泉疗养地和五星级酒店。岐江公园从几个方面打破了这种当时盛行的风气：大量使用公众熟悉的野草和水生植物，包括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纸莎草（*Cyperus papyrus*）、睡莲（*Nymphaea* spp.）、菖蒲（*Acorus calamus*）、花叶芋（*Caladium hortulanum*）、竹子等，许多都是这一区域的稻田和鱼塘中常见的植物，在东西方都常被贱视为蔓延性的野生植物。此外，乡土文化和大众美学不只是在野草之美中展示，它们也体现在对造船厂工业遗产的利用上。

俞孔坚对美国 and 欧洲的一些公园设计中工业遗产保护的经典案例十分熟悉，包括理查德·哈格在西雅图的煤气厂公园，拉茨在德国的杜伊斯堡景观公园，但是这种尝试在中国则没有先例。（事实上，

俞孔坚后来受国家文化部文物局的邀请，参与起草了工业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⁶。）这一景观是向市民免费开放的（同俞孔坚其他的公园作品一样），更激发了公众的广泛好评。至少直到目前，在中国要进入许多公共景观还要支付象征性的门票费，尤其是那些历史遗址点。俞孔坚建议岐江公园免费开放，最终得到市政府的认可，因此岐江公园成为中国最早的没有围墙的公园之一。

保留场地上工业历史的记忆，是岐江公园设计的另一重要特色，这体现在公园的景观要素的设计中。公园平面的一些重要节点上，设计了许多雕塑。其中最显眼的一个是红盒子，坐落在穿越场地的一条主要道路上。尽管在西方人的眼中这个立方体的盒子与极简抽象艺术派的雕塑没什么两样——例如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之类艺术家的简单几何构架——但俞孔坚坚持认为红盒子有其乡土含义。它的尺寸和形状与当年的工人宿舍相当，保留了关于集体宿舍的记忆；它是由再利用的钢板制作，并被漆成毛泽东时代的红色。在它附近，交叉的树篱也试图营造同样尺寸的空间，用来唤起工人宿舍的记忆（但俞孔坚说，那是为情侣们准备的，因为他们在当前城市里无处可去）。

在保护工业厂房和再利用铁轨的同时，这些对该场地原有工人宿舍的暗示也试图唤起关于“大跃进”那段历史的记忆。俞孔坚在谈到这段记忆时心情很沉重，他说记忆和欣赏完全是两回事。他对毛泽东时代的记忆有他自己的理解，他承认强迫农民进行工业大跃进带来了突发的严重饥荒。在红盒子边，人们可以看到由俞孔坚设计的一段解释性的文字，其中包含引



中山岐江公园红色方盒子，营造了不同的层次和视角，与当年肇基的工人宿舍有着同样的形状结构和尺寸。



迁安三里河绿色廊道，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要算是在阳光灿烂日子里恣意绽放的野花。

用的列宁的一个短句，“忘记历史，就意味着放弃”，那是他孩童时代就记住的一句话。俞孔坚说，这个短句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在这个项目中，他似乎是不会忘记父母那一代人的艰苦的，他不会忘记他们的文化植根于农耕文明，也不会忘记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的奋斗。我在此也提出一些文化方面的观点，有待深入探讨：在国际认可的当代设计习语中，俞孔坚在努力创造一些有着本土风格的作品。没有大声指责，俞孔坚试图静静地唤起一段关于过去不久的痛苦的记忆，而这段记忆看起来将在无意识中逐渐消逝。而在中国，公开的关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是一种禁忌。俞孔坚在将政治历史转化为公共历史，从而唤起公众关于一些重大事件的记忆，这些重大事情仍然影响着许多中国人的生活。

不管俞孔坚的作品风格多么现代，也不管他多么忠于“大脚”美学，俞孔坚的作品还是受到传统中国园林“小脚”风格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对传统大门和入口的借鉴，视觉层次感的营造，小桥和水上亭台的使用，以达到人在水上自由徘徊的效果（尽管俞孔坚对那些古怪的被侵蚀过的石头，即在传统中国园林常用的太湖石，毫不以为然）。在岐江公园，入园的一个大门是利用龙门吊改造而成的，一处平台如小船浮在内湖中央。红盒子则是几种功能的综合体：它是一处门，内有小桥，同时也是水上的一处临时展厅，并且营造出多种视觉层次：进入、穿越、离开。传统园林使用类似策略使得小空间变得开阔，然而，这里

的功能恰恰相反：将一片较大的空间变得更加紧凑。这些手法是俞孔坚设计中精心的文化构思的另一部分：他尝试精心设计那些普通的空间——不管是植物搭配还是对工业历史的展示——使它们既体现设计的艺术，又能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

如果说岐江公园最重要的主题在于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那么土人景观最近的许多项目则是以生态恢复为核心目标。其中很出色的一个是滨水生态系统修复的案例：迁安，在北京以东大约三小时车程，一条环境严重恶化的滦河支流三里河，被改造恢复成生态绿道（2010年）。由于地下水的过度开发，这条河流早已干涸，变成附近工厂和居民区倾倒垃圾和排放生活污水的场所。项目设计从滦河上游引水进入三里河，恢复水流，考虑到不同季节滦河水量的不稳定性，河道设计成串珠状水塘和湿地——既营造了湿地的视觉效果，也可方便于垂钓和其他娱乐活动，



红飘带公园，2006年，附近居民在其间活动的丰富生活场景。



桥园湿地公园，湿地池塘旁具有休闲功能的教育意义的水上平台，为家庭野餐提供了私密场所。

同时有助于改善水质。这条绿色廊道穿城而过，长约13公里（8英里），廊道上错落点缀着观景塔、垂钓台、栈桥、小广场，河流两侧都有步道和自行车道。项目最引人注目的景观效果，可能要数三里河两岸大量栽种了低维护成本的乡土植被，温暖的季节里水草繁茂、野花烂漫，从春天的金鸡菊（*Coreopsis* spp.）到秋日的本土菊花（*Chrysanthemum* spp.），后者将三里河两岸变成一片金黄色的海洋，空气中弥漫着菊花的芬芳。

另外一个更著名的项目位于附近的滨海城市秦皇岛，沿汤河两岸，占地20公顷（49英亩）。被称为红飘带，这个项目将一处无人关注、垃圾成堆、人迹罕至的河道改造成魅力无穷的城市休憩地。俞孔坚说，它是一次尝试，利用最少的人工与投入，达到最大的回报。最大限度保留现有植被，包括成年的柳树、刚种上的杨树，衬以土人景观常用的沼泽草类、阔叶草类、和其他的河岸树种。这条廊道由三条简单的线性道路组成：一条沿河的木栈道，一条公园外缘的铺装道路，另一条则是位于两者之间的游步道，其中有500米（550码）长的路段为一条以玻璃钢为材料的红飘带，蜿蜒于绿树和草丛中。这条红飘带大约高0.6米（2英尺），宽0.3–1.5米（1–5英尺），整合了多种功能和设施，包括步道和座椅、游戏和音乐、成年人的社交和儿童的玩耍。红飘带中点缀着种植池（主要为植草池），在它顶上和两侧布置了灯光。与其说它呼应着当代景观设计的流线型设计，不如认为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中国书法的行云流水。它的大红颜色仍

被用来唤起“红色文化”。俞孔坚强调这种文化在这一地区曾十分强烈：1954年夏天，毛泽东曾经在此疗养，并且赋诗一首，诗中提到了秦皇岛市⁷。不管设计灵感来自何处，毫无疑问，这一滨水景观的设计以最小的干扰获得了最好的效果：修建成本低、形式简洁，强烈地吸引人们进入景观，融入场地。在晴朗天气，这里通常聚集了数十个来自附近的访客。儿童在尽情奔跑嬉戏，老年人在玩扑克，情侣偎依在一起。尽管这种类型的社会性是中国公园所特有的，但由于缺少其他娱乐场所，生动、活泼而又优雅的红飘带公园尤其具有吸引力。它甚至已经“太受欢迎了”——很明显场地已经被过度使用。现在，土人景观已经接受地方政府委托，展开河流对岸类似绿地的恢复规划。

他的设计院也完成了另一项位于秦皇岛的滨水生态恢复项目（2008年）。项目利用一处旧的防波堤，为水鸟提供了岛屿状栖息地。一条宽阔的步道贯穿场地，连接附近一处废弃的河口，并沿着游客可及的海滨蜿蜒前行。在河口内，设计者恢复了沼泽湿地和滨水植物，并且通过醒目的标识，提醒人们要对生物栖息地进行保护。项目也包括一处位于岸边草滩上的鸟类博物馆，周边有季节性的小水塘，可为鸟类和两栖类提供栖息地。总之，相比于土人景观的其他方案，这个项目并不如其他项目显眼，也许因为它缺少标志性的艺术元素——诸如红飘带或中山岐江公园那样的。但这也也许恰如其分。这处海岸离市中心好几公里，它的定位既要为水鸟提供栖息地，也方便公众接近海滩。



桥园湿地公园，2008年，高空步道悬架于两个台地之间，分布在公园的两条与城市建筑相邻的边界上，从高架步行桥上低头可见一系列下沉式城市小花园



后滩公园，园路分叉，公园中央的小溪、亭子/雕塑，以及保留下来的工业建筑骨架，2010年，汀步沿黄浦江河岸形成一条小道，穿越一系列树林；在内侧堤坝顶上一条步道，形成一条更显眼的游步道；还有一条栈道在湿地河谷的底部，穿过芦苇丛，沿着水边贯穿整个公园的中心带。

同世界上其他致力于恢复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工程一样，设计变得不太显眼——甚至可以说没那么重要。

桥园公园位于天津，一个离北京 200 公里的港口城市，土人景观在桥园公园的设计中实现了生态功能和趣味设计的结合：适应调色板。这个项目的特色在于人造湿地。该场地原先是打靶场，占地 22 公顷，近些年来逐渐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垃圾填埋场。公园正好是该城市边缘正在开发的住宅区的核心地块。场地的西侧和北侧被周围的房屋和一条高架高速路所框限。桥园公园分为三个区，离城市最近的两边是高架人行天桥，连接着一系列高台和沉床园；原有鱼塘改造的湖区构成中间地带；还有在湖区和高速路之间的区域，是人工湿地区。场地中的瓦砾垃圾则被用来营建小山，保护湿地避免来自高速路的干扰，在这些小山上，种上了能够适应贫瘠条件和盐碱土壤的旱地植物，如黑松（*Pinus thunbergii*）和西府海棠（*Malus micromalus Makino*）等。

这些“湿地泡泡”逐渐因那些能够适应潮湿、盐碱和不同土壤 pH 值的乡土植物群落的侵入而变得生机勃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群落在不同类型的池

塘边缘生成，有些池塘比较深，有些比较浅，有些是季节性的，有些是“反地形”——建在高台上的洼地。在平面图上，它们是明显的细胞状布局结构；而在场地里，这样的结构只是隐约可辨，因为这些池塘都散布在沼泽芦苇丛中，以团状的树木来组织空间。雨水被收集入这些池塘，因为地下水位很接近地表，加上地下水是碱性的，那些深一点的池塘盐度便较高。步道交叉穿行于池塘之间，在交叉处则点缀着树丛。从这些园路又引出栈桥穿越苇丛，连接深入池塘中的平台。

这个公园展示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视觉和体验品质，台地上的种植模块、红色的金属廊桥和楼梯使得它在城市的边缘显得极富有建筑感；但对于湿地区域，则放任其自由生长，狗尾草（*Setaria viridis*）和柳枝在风中飘舞。公园的散步道为游客的探索提供了可能性；湿地泡泡中的平台为家庭野餐提供了隐蔽空间。这不是一个完全自然的景观，但却是一个令人熟悉的景观，习以为常的乡土植物以“杂草”的形态存在——它们因坡度、土壤湿度和盐碱度不同而分布于景观中。

土人景观的生态恢复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或许应当算是上海后滩公园的水净化生态湿地设计。它紧

邻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场。这个项目是参加上海世博公园设计竞标的间接产物，在世博公园的国际设计竞赛中，土人景观是最后两位获胜者之一，不过他们最终并未获得设计委托，而是尔后被邀请设计一个临近地块。该地块占地 14 公顷，是一个沿着黄浦江的 1.7 公里长的线性地块，处在上海世博会主会场的上游。历史上这是一个船厂和轧钢厂的堆料场地，紧邻世博临时停车场，周围计划作为混合功能地产开发。场地因离主要景区太远，比较不易被光临世博会的大多数游客发现和使用。

当世博后再开发工程完工后，这个公园将成为临江地区中一个极有活力的地段。今天它似乎是一个城市废弃地中的孤立地块。事实上，它看上去更像是一段飞来的原野地，但是，公园设计所要实现的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对未来的憧憬，它是要为生态服务和生产性的景观创造一个样板：土人景观设计了一个水处理湿地，同时也是一个社交空间，每年可以生产好几轮不同的粮食作物，为野生生物，特别是鸟类提供栖息地。公园还是一个优美的富有教育意义的场所。场地大，目标宏伟，工程实施的周期却不长：从 2007 年开始项目设计直至 2010 年建设完成，这个项目共计花了三年时间。

公园的故事要从场地里小溪的上游源头讲起，从江里抽过来的浑浊的污水在一个大储水池里沉淀后，在重力作用下，被引入一条细长的导水墙，涓涓细流从粗糙的岩墙上跌落；然后渗入成排的树木下的土壤中，再流过密集的水草，然后汇入第一组湿地中，这段水的过滤过程落差两米。这段前奏便确定了整个公园的曲调：繁茂的植物，多样化的配置，完美的细节（尤其是具有曝气功能的跌水墙上的石条）。沿着整个公园，每个湿地池塘都被种以成片的植物以去除水中的污染物；湿地池塘间通过砾石坝相分隔，这些砾石具有过滤作用。有好几处地方设置了砾石床，用以曝气。这样一套系统每天能够处理 2400 立方米的水，从劣 V 类净化为 III 类水，水流完全程需要一周的时间，最终汇入下游末端的一个开敞水池中——供给世博公园的喷泉和水池用水。⁸ 俞孔坚对此引以为豪，因为他的公园在生产干净的水，而世博园的其他绿地却在大量地消耗水资源，而且他的公园耗费很少。

雨洪控制也是这个公园的功能之一。土人景观将混凝土防波堤从河畔移走，代之以双层堤坝，一个沿着河岸，用以防范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另一个更高的坝，位于内陆边缘，用来防范千年一遇的洪水。两个防洪堤之间的湿地构成公园的核心带。如同在中山岐江公园一样，该场地的遗留特征也得到保留：一片江滩自然湿地被保留下来并得以扩展；一个轧钢厂的厂房骨架被保留下来，涂成红色，被重新利用作为展览馆供世博会使用（在世博会之后它将用作餐馆或茶室）。一个老的货运码头被改造成一个钓鱼台和凉棚，场地内留下来和回收来的砖块和石块被用作公园的路面铺装。

三条线性通道作为人行道。首先由汀步形成一条沿河岸的步道，穿越大片的树丛；内陆更高处的堤岸上有一条步道，形成一条更显眼的长廊；还有一条栈道在峡谷底部穿过芦苇丛，沿着水边贯穿整个公园的中心地带。到目前为止，这是公园里最具魅力的步道，有时悬在水上，有时又消失在芦苇和草丛间，它为游客深入地近距离观察公园里各种水生和陆生生态系统提供了机会。沿着中央的湿地主线，有几个分叉，有些通向土人的标志性的红色玻璃钢长椅；沿着栈道，有数个重复出现的锈钢板材折叠起来的漂亮凉棚或是环境装置。这些生硬的、锈迹斑斑的缎带与旁边线性的红色长椅遥相辉映。它们也构成了场地工业记忆的又一个提示——曾经在这里生产的钢铁板材同那些在这儿找到的锈迹斑斑的残骸一起，唤醒了场地的历史记忆。



后滩公园，芦苇夹道的栈道，这些植物看起来像是自然生长的，但实际上却是在精心管理之下的。